

中医药为何能有效防治新冠肺炎

□ 张伯礼

直到现在，国际上仍然认为，治疗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可为什么偏偏中医药能够获得如此奇效呢？

要说清楚原因，先讲一讲新冠病毒是怎么回事。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引起重症，进而导致死亡，虽然比例不高，但因其传染性强，患病基数大，重症患者绝对数自然就多。

新冠病毒入侵人体以后，引起人体的一系列免疫反应，这时候可有不适症状，一般不会导致死亡。但是需要关注的若是免疫过度反应，释放太多的炎性介质，则可引起“炎性因子风暴”。在此次疫情当中，大多重症病人是因为免疫系统过激反应引起了“炎症风暴”，造成了病情急剧加重。

免疫系统是人体自身拥有的防御系统，当病毒入侵并被识别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派出大量的免疫细胞去肺组织解决问题，形成了肺炎，患者表现为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但是由于仅凭它们还不能准确歼灭病毒，于是免疫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激活更多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再分泌

更多细胞因子找来更多免疫细胞，于是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就越来越多，形成了“细胞因子风暴”，即炎症风暴。由于它们进行的是“无差别”攻击，所以肺里大量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形成严重肺炎，从而影响肺的功能，在肺部CT上表现为大片白色，也就是“白肺”，患者会呼吸困难甚至衰竭，直至死亡。当然，呼吸衰竭不是唯一的死因，许多死亡病例是死于心脏、肾脏、肝脏衰竭，而令这些脏器受损的主要原因就是病毒诱发的炎症风暴。

认清了新冠病毒的危害，那么我们说说中西医对新冠肺炎的不同看法。

中医和西医是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走的是两个路子。西医认为，新冠肺炎是新冠病毒引起的，那就消灭病毒即可，这种思路简单明了，容易被人理解，治病不就成这样吗？要针对病因治疗啊！可是，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消灭该病毒的药物或方法。

中医在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医不仅仅关

注疾病本身，更关注患病的人，关注的是与疾病相关的各种因素。打个比方，一间屋子里堆了一些垃圾，生出了很多虫子，西医的办法是研究杀虫剂，消灭虫子。中医则采用清除垃圾，改善环境，屋里干净了也就没有虫子了。这就是中医的理念：审病求因，治病求本，调理机体代谢，帮助人体提高抗病能力，自己治愈疾病。也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正与驱邪并重。

我们要了解病因是什么，更要清楚根本问题在哪里。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发病，有的人不发病，有的人表现轻，有的人表现重？不同的人体内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表现。所以，中医基于整体观念，通过辨证论治，在考虑到及早清除病毒的同时，又要考虑如何改善体质，改善内环境，避免再次染病。调阴阳，畅气血，保证机体运转正常，维护身体健康。对中医如何起效，现在也可揭示其作用机理。中医认为新冠肺炎属于“湿毒疫”。针对该证型研制的“三方”之一的宣肺败毒方，通过现代研究显示，宣肺败毒方能通过21

个通路调控病毒感染的286个相关靶标，调节过度激活的免疫反应，抑制炎症因子风暴，同时也有保护脏器功能，甚至还有抑制病毒复制活跃作用。所以讲中医是多组分、多靶点，发挥综合治理作用。

当然，中医治病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中药，也包括针灸、按摩、拔罐、运动等手段。两年多来几十场抗疫也证明了，中医采用综合手段治疗的新冠肺炎，具有核酸转阴快、复阳率低、转重率低的明确疗效。而转重率低是病死率低的重要前提，没有重症，也就没有死亡。

中西医各有所长，不同的疾病类型，中西医发挥各自优势，特殊情况下，任何一个医学都不敢单打独斗，需要取长补短，有机结合。事实也证明，中西医结合救治重症患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论何种医学，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医学，我们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更早实现健康中国战略。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家谈科普

新冠肺炎是席卷全球的一次大瘟疫，截至2022年初，这一场持续了两年的传染病仍在肆虐，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超过4.3亿，死亡人数将近600万，其对社会影响之大、之深、之烈超乎想象。

在全球抗疫的大军中，中国可谓一枝独秀，我们仅用了半个月就抑制了疫情的快速蔓延，在此后多轮疫情阻击战中，总是能够快速遏制疫情抬头，并且保持了极低的病死率，中医药在其中功不可没。

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在治疗轻症患者、降低转重率方面效果显著；中西医结合对重症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降低了重症患者死亡率。此外，中药、针灸、按摩、八段锦等疗法能够明显改善乏力、焦虑等症状，修复免疫系统功能，促进肺部炎症吸收，使患者尽快康复回归社会生活。

多姿多彩的海洋科幻世界

□ 付昌义

探索海洋一直是人类多年以来的梦想，而关于这方面的科幻作品，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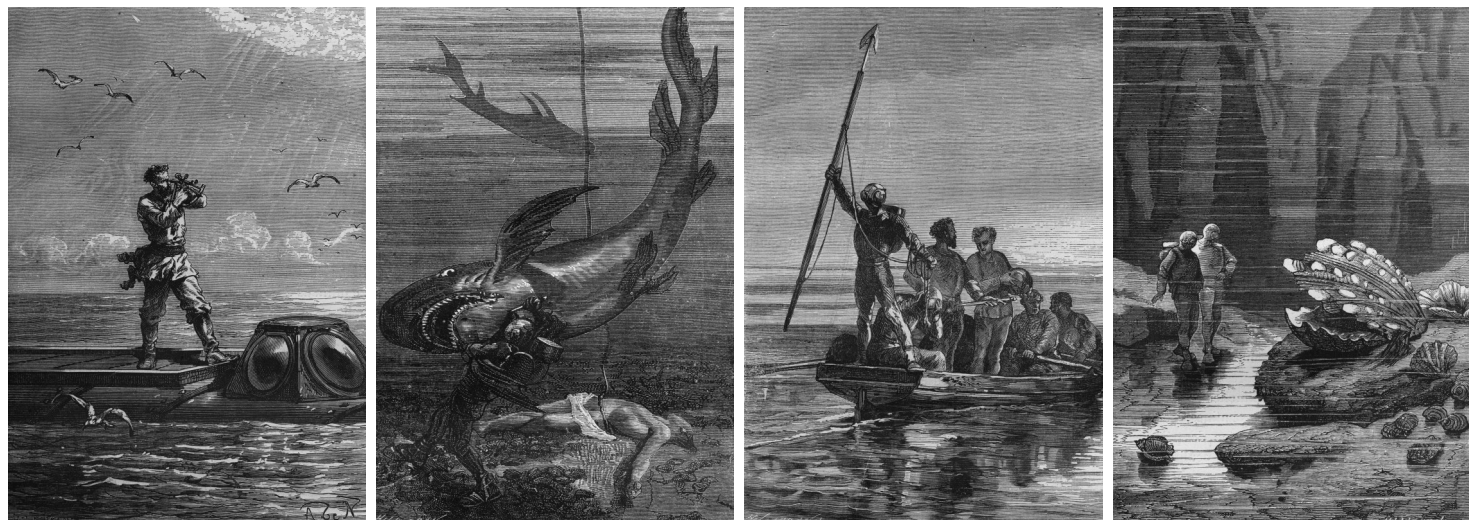
《海底两万里》启发了潜水艇的改进

《海底两万里》说的是尼莫船长和他的“鹦鹉螺号”，以12公里的时速，在近10个月时间、行程8万公里（小说中的里是指法国的古陆里，1古陆里约等于4公里）的海底旅行中，和他的“客人们”饱览了海底变幻无穷的奇异景观和形形色色的生物。旅行从日本海出发，途经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极，最终到北冰洋。期间经历了海底狩猎、参观海底森林、探访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打捞西班牙沉船的财宝、目睹珊瑚王国的葬礼、与大蜘蛛、鲨鱼、章鱼搏斗，反击土著人的围攻等惊心动魄的故事，最终回到挪威海岸。

有一种关于《海底两万里》的误解是，这部作品预言了潜水艇的发明。其实，早在凡尔纳写小说之前就有了潜艇的存在，他还看过塞纳河上的潜水艇试验，并在1867年世界博览会上参观过当时展览的潜水艇。不过他的小说确实启发了潜水艇的改进，美国发明家西蒙·莱克在阅读了《海底两万里》后，迷上了海底旅行和探险，并于1898年制造了第一艘在公海成功航行的潜艇，还收到凡尔纳的贺信。莱克在他的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美国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正是纪念凡尔纳的伟大构想而命名为“鹦鹉螺(SSN-571)”号。而这也反映了科幻与科学的关系，科幻很多时候并不能直接预见某种科学发明，但会预见科学的发展。

海洋科幻探险设备花样翻新

俄罗斯科幻作家别利亚耶夫也创作过海洋科幻三部曲，分别是《水陆两栖人》《最后一个大西洋人》《沉船岛》，这三部作品的科幻色彩明显就浓厚得多。《沉船岛》是关于“百慕大三角”之谜的故事，别利亚耶夫为“百慕大三角”之谜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这篇科幻故事中，在“百慕大三角”中失踪的船并没有沉没而是漂流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荒岛，在这个荒岛上不同国籍的劫后余生者组成了一个有着众多政治斗争的小“社会”。《最后一个大西洋人》则是关于传奇的大



图为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代表作品《海底两万里》的插图。（视觉中国供图）

西洋洲——亚特兰蒂斯岛的故事。公元前350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对话录《克里提阿斯》和《泰密阿斯》中曾描述过亚特兰蒂斯岛，他写道：“传说12000余年前，有座亚特兰蒂斯岛（大西洋洲），建立在岛上的亚特兰蒂斯王国曾征服过埃及与北非地区；在与希腊人作战后，亚特兰蒂斯人退回了自己的国土。后由于火山的突然爆发，仅一日一夜的工夫，这块陆地便沉入了海底。”别利亚耶夫正是根据柏拉图图的描述，添加了自己的想象，创作出了关于亚特兰蒂斯王国由兴盛到灭亡的故事。

《水陆两栖人》则是描绘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被一位神奇的医生移植了鱼鳃，变成了可以在水陆生活的两栖人。这个故事也启迪了后世很多科幻作品，像我国最早引进的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还有韩松的《红色海洋》，这些作品中都有两栖人的踪迹。

凡尔纳与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也启迪并引领了很多后续的海洋科幻作品，并形成海洋科幻独特的类型。比如有一些科幻中有关于潜艇和海洋探险设备的描述。

除了《海底两万里》写到了潜水艇，中国的早期科幻中也有关于潜水艇的描写，晚清作家吴趼人1905年在《指南报》上连载了小说《新石头记》，其中描写贾宝玉来到晚清时候的中国，见到许多前所未闻的事物，有

一场场景就描写到宝玉乘“海底潜艇”绕地球一周探险。另外，许地山的《铁鱼的腮》也是一部新型潜水艇的科幻。

此外，凡尔纳自己还创作过《机器岛》，设想人类在大海上造出了一个钢铁的岛屿，在这个由钢铁制造的机器岛上人类可以耕种农作物、制造机器，甚至可以控制天气，不用离开岛屿就可以满足所有的衣食住行。

林林总总的海洋科幻生物

另外还有一些海洋科幻是关于海洋中的生物。像我国科幻作家迟叔昌，1963年就写过《大鲸牧场》，描绘未来的中国人在海洋中“放牧”鲸鱼。当然现实中大鲸牧场还没有实现，但深海之中的三文鱼牧场却早已变成了现实。此外郑文光的《鲨鱼侦察兵》和刘慈欣的《鲸歌》则聚焦在了改造利用海洋生物，只不过一个是利用鲨鱼发现敌国的潜艇，一个则是利用鲸鱼来运输毒品。

此外，关于海洋中的怪物也是海洋科幻中层出不穷的主题。比如捷克作家恰佩克的《鲑鱼之乱》，科幻电影《大白鲨》和《哥斯拉》系列等，还有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水形物语》，也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当然，深海中除了怪物也可能有外星人，比如科幻电影《深渊》中的外星生物就

深藏于海底。同时，人类也有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生活在海洋中，比如《未来水世界》中人类的手脚长出了蹼。韩松的《红色海洋》则更直接，人类演变成了鱼鳃，只能生活在海洋里。当然，这些想象都不如给海洋赋予生命，如波兰科幻作家莱姆的《索拉里斯海》把外星球的垃圾直接想象成星球最大的生命体。德国科幻作家弗兰克·施茨廷的《群》则给了海洋生物赋予了报复人类的智慧。

海洋面积占了地球表面的71%，人类的命运也是与海洋息息相关的，所以还有更多的科幻关注的是人对海洋的污染，如陈楸帆的《荒潮》、灰狐的《固体海洋》、凌晨的《海平面下》、吴明益的《复眼人》。这些作品关注了海洋周边的电子垃圾，大海深处的塑料垃圾以及海洋中的赤潮，并用超自然的想象提醒我们，如果人类对海洋只有索取没有保护，则大海对人类的报复也会很快袭来。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主任，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



司马红委员：建立完善数据中间商制度

在我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数据要素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流动则成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科协常务副主席司马红认为目前大数据交易所发展并不顺利，缺少与数据要素特点相适应的数据交易市场机制设计，交易主体不明确、交易规则不健全、数据来源不清晰以及交易链条不完整，是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化进展缓慢、大数据交易所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

因此，司马红建议，一是建立完善以数据中间商为主体的数据要素交易顶层设计。成立专门的数据交易中间商监督管理部门，承担数据交易中商的身份认证、业务指导、行业标准、监督管理等主体职能；在国家层面出台数据中间商市场的法律政策，树立数据中间商的合法地位、厘清数据中间商的业务红线、明确数据中间商的法律责任，为数据中间商的监督管理提供法律和制度依据。

二是建立数据中间商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于从事数据业务的机构，应在资金投入、技术水平、业务能力、组织架构和内部控制等方面设立明确的标准，建立实施数据中间商业务行政许可制；对于从事数据业务个人，则应建立数据交易相关的市场、技术、法律、风控等相关知识的资质考核机制；针对在数据交易中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和个人，建立数据市场终身禁入机制。

三是推进大数据交易所由交易主体向监管主体的职能转变。各地的大数据交易所除部分承担公共数据服务职能之外，应大力推进以数据中间商为主体的区域数据交易市场建设，在区域内承担市场监管、交易督导、标准执行、风险预警等管理职能。

□ 科普时报记者 马爱平

鲁迅冷眼看“神童”

□ 刘为民

最近一个时期，体坛艺苑新秀辈出，成绩优异，博得一片喝彩与艳羡。面对手机朋友圈里“中外神童”“才能异禀”的话题，我也不堪其扰。其实，一百多年前，鲁迅也遇到过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他就冷静、客观多了。那是1918年10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了鲁迅的著名《随感录》，批评被赞誉“生有异禀，周岁识‘之’、无’、三字能文”，当时不过才十一二岁的“神童”——江希张。

泉城济南东侧不远处是著名的龙山古文化发源地。1907年3月，当地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生了个男孩。其祖父是文盲，发愤供儿苦读，20多年后，儿子成为方圆十几里都很有名气的文人，还著有《孙孟图歌》《兴学创闻》等通俗读物。儿媳幼年读过私塾，还考上过山东的女子师范学校。现在孙子诞生了——就是江希张，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幸运儿。他自幼读书识字，表现出过人的聪明才智。文献记载这个“神童”，曾一度被选为晚清末帝溥仪的“伴读”。

1914年，江希张的父亲突发奇想，请人代笔“协助”刚刚7岁的儿子编写出一套《四书白话解说》丛书。江希张虽然号称“神童”，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后来据他本人回忆，《四书白话解说》里，属于死记硬背的“自己的东西”不过一半；另一半是姓周的一个“师兄”和其他几个人共同编写的。但是，全书署名只有“七岁童子江希张”。其时已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文化风云激荡，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学

说风靡一时——他们大胆抨击、批判几千年来的封建儒家思想，引发各界人士的巨大反响和广泛传播。“神童江希张”的《四书白话解说》语言浅显易懂，乃至解说“新鲜明晓”，此书一出版立刻轰动国内学林，印行了上百万部，“竟畅销全国，版权收入亦颇可观”。自然而然，江希张的名字，也成为各大报刊竞相宣传的舆论热点。

有趣的是多处文献证实：就连康有为这样的论坛名家兼学林泰斗，看了“神童江希张”的“专著”之后，也立即亲笔写信勉励，盛赞江希张“堪称民国第一神童”，为“今之项橐”并表示愿意破例收“江希张为弟子”。不难想象，江希张父子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立即直奔上海，拜谒那个时代依旧“如日中天”的康有为。

这时的鲁迅，已经随南京政府教育部迁往北京，她始终关注社会文化，尤其是能够反映国民精神的各色社会“新闻”。读了名噪一时的“神童江希张”的系列“大作”，鲁迅感到啼笑皆非，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稣的糟粕，乱作一团”，还“写出《三千大千世界图说》”。“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讲地狱的也不过是抄卖《玉历钞传》”。鲁迅还联系了这个被成人操纵利用的“神童”，并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随感录》，特别指出当时“科学与鬼话”的社会问题，就是“先把科学东扯西拉，广造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等等。

后来江希张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了“无神论”观点。对家庭和

私塾强制灌输的学问，越来越反感，厌烦了被干扰、被强制的“神童”生活，向往能够无忧无虑地“疯玩”……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年轻人创造出难得的历史机遇，江希张也迎来了他的新生：告别“神童”，重塑自己，尤其是渴求现代知识，拥抱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与科技传播。

1927年春，20岁的江希张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化学专业。他学习十分刻苦，无论什么考试，往往都是名列前茅。1931年回国后，江希张参照自己的留学所见所感，对比古今中外的科学与哲学，更加认识到自己幼年署名出版的《四书白话解说》等书，纯属欺世害人。抗战爆发后，江希张出国在南非担任过《侨声报》总编辑。1946年回国后改行，在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经济封锁，国内许多工厂因缺少原料而濒于停产，江希张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建议充分挖掘国内资源，以代替进口原料。为此撰写了十几份调查研究报告，引起了领导机构和专家的重视。很快，他被调入化工部所属的公司、设计院任总工程师一直到离休。这期间，江希张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化工与轻工事业建设上。他完成很多科研项目，应邀在全国各地作学术报告，担任十数种专业书籍的校审和顾问——成为我国化工学界和轻工业界享有盛誉的高级专家。

文坛赛先生

历史上，不乏择邻而居的典故，“孟母三迁”就是其中相传久远的故事，讲的是孟郊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而多次迁居。

在现代都市里，择邻而居不可能都如愿。笔者所居大院的人文环境，相对比较和谐，有利于邻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辛丑年刚过，笔者就收到邻里赠送的带有墨香的诗文集子，还不时收到赠书电话，多是同住大院的芳邻之作。他们中有谢国明领衔撰写的《中美关系五十年：1969—2019》一书；有袁鹰主编，缪俊杰、王必胜副主编的《古韵新声诗三百》；有颜世贵和一双女儿出版的文集《星光闪耀》《错位》《细听》；缪俊杰的长篇小说《烟雨东江》；刘正学旅游散文集《往事回忆录》，等等。

进入网络时代，读书的少了，读纸质书的更少。但我还是信奉王蒙说过的一句话：“书是捧着读的”。只有捧着读，才有读书的感觉，体味一本书的质感与厚重。

一位年长的芳邻曾感慨地对我说：“现在读书的人少了。给不喜欢读书的人送书，无异于给人添麻烦。知道你还没读书，才送你几本。”

今春收到芳邻的书，尽管来不及精读，但多是花些时间细翻品读，了解其内容，分享其文采。如，《中美关系五十年：1969—2019》一书，以时间为序，系统梳理了1969—2019年中美关系发展史。作者通过故事形式专章叙述，细致再现、深入浅出地诠释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并力图从中美各自的认知体系出发，就认识中美关系的不同维度，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对更加准确地把握中美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推进中美关系早日回到良性的轨道上来，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古韵新声诗三百》，搜集了近、现、当代的旧体诗三百首，其中包括孙中山、鲁迅、章太炎、叶嘉莹、王蒙等跨世纪诗人的诗作，以光大诗学传统，记录实绩，启迪后世，成为一份新的文化记录。

颜世贵近些年出版了多本有厚重感的书，均赠过我。今春赠我的他们父女文集《星光闪耀》《错位》《细听》是散文集，书中写了不少各界名人。

刘正学兄是位高产记者，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文部、理论部、国际部工作过。他到报社不久，即被派往抗美援朝战场当军事记者。他曾先后任报社驻多个国家首席记者，写了不少国际时事通讯、评论。退休后，他笔耕不辍，又写了许多散文游记。他近日相赠的《往事回忆录》，以珍贵的图片和酒脱的文字，回望了他驻外及退休后的许多难忘记忆，展示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媒体人的心路历程。

对同住大院的缪俊杰兄，过去我只知他在文艺评论方面颇有造诣，经常从报纸副刊上读到他的观点独到的文学评论。后来知晓他出版有长篇小说《烟雨东江》，才知缪兄还有写小说的天分，是多面手的作家。3月2日上午，满头白发的他，在阳光明媚的台园赠我两本书，其中有厚重的70万字的长篇《烟雨东江》。小说通过三个家族客家人几代人的命运，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